

紀念恩師林毓生先生

Remembering My Beloved Teacher Prof. Lin Yu-sheng

傅可暢 (Fu Keh-chang) *

2022 年 11 月 23 日中午，接獲同門學友轉來師母宋祖錦女士發給大家的通告，得知恩師林毓生先生已於美國科羅拉多州當地時間 22 日上午 7 點 49 分安詳辭世。當下內心感受是雙重的，一方面被深重哀痛所籠罩，但另一方面也為老師終於解脫病苦而略感寬慰。

當日下午及晚間，我只能在書房中來回踱步。前塵往事，縈迴腦際；恩義情懷，翻攪心頭。直到深夜才平復下來，勉強以一簡短電郵向師母敬致哀悼之忱：

師母平安：驚聞老師仙逝，內心無限傷痛。近年因遭逢若干磨礪試煉，久未向老師和師母請安問候，深感愧疚。老師高尚的人品，以及他所給予我的關懷和恩情，學生始終銘記在心。懇請師母節哀順變，保重身體。生可暢稽首敬悼。

我真切傷痛，因為老師於我恩重如山，感深至骨。我也確實愧疚，過去十年個人所經歷的挫折試煉，驅使我逐步走入閉門自修、息交絕遊的狀態。即使在老師出現病苦折磨的情況之後，我也只是從學友們的電郵往來中默默關注著老師的病情變化，卻從未主動問候。於情於理，我這樣的不作為都是說不過去的。

林老師逝世不久，悼念文字陸續湧現，多半集中討論他的思想史研究，以及他畢生堅持的自由主義理念。有關老師的學術成就和思想貢獻，將來自有客觀定論。在此只想就我與老師之間有限的互動經驗，透過個人視

角，為林先生的高尚品格與真摯性情留下一份真誠記述。

最早聽聞林先生的大名，初步認識他的學說觀點，始於 1970 年代末期興起於臺灣的思想史熱潮中。在若干媒體、出版社的運作之下，他和余英時、張灝二位先生成為當時最知名的華裔美籍學者及文化明星。三位先生的美籍身分為他們的言論提供了基本的安全保障，美國一流學府的學術光環又為他們的觀點構築起無與倫比的權威地位。

多年之後的世紀之交，林老師在一次返臺與學生們的聚會中，回顧了當年那種萬人空巷的演講或研討會場面，也感慨那是一個特殊時代背景下的不正常現象。他強調，一場涉及思想或哲學議題的講座，吸引一、二十位聽講者才算是正常的。然而，當時的臺灣正面臨著威權政治與民主訴求的矛盾衝突，社會變遷所產生的巨大能量正急切尋找著宣洩出口。一場學術講座動輒出現數百甚至上千位聽眾的參與著實令人驚訝，更進一步鼓舞著演說者的論述熱情和社會使命感。林老師後來也確實懷抱著崇高理想，為推動華人社會的民主化而竭盡心力。可歎的是，到了 2010 年代，他又曾不止一次在我們這些老學生面前總結過去三十多年的社會實踐。以臺灣為例，他毫不諱言，基本成就為零，半生努力成空。這一評價，既反映了他內心的失望蒼涼，又充分展現他無所避忌的本真性情。

* 作者為美國威斯康辛大學麥迪遜校區博士。

當年那一波的思想史熱潮，對我們這一世代的臺灣學子影響極為深刻。在 1980 年代赴美留學的人文領域研究生中，選擇攻讀思想史專業的就佔了極大比例。我個人在當時並未搶搭那班列車，反而選擇與主流大軍保持距離。一方面是因為高中、大學時期的我，深陷於人生根本議題的苦悶中。在師長的勸誘下，比較傾向於從傳統文化中汲取精神滋養。另一方面，不知何故，我對於自由主義論述總覺得扞格難入。一如我對於基督教的根本排拒，或許皆源自中國近現代史的民族悲情烙印。當時我也知道，那些皆屬青年時期的思想偏見，猶待日後梳理，乃至超越。

1987 年秋，我進入美國威斯康辛大學麥迪遜校區（UW-Madison）社會學系碩士班就讀，開始有了近距離接觸林老師的機會。但由於當時的我內心另有關注，因而並未積極向林先生請益。冷戰期間蔣氏政權下的成長經驗，激發出我內在的一種逆反心態。從《魯迅全集》到馬克思主義理論、中國現代革命史……等，我開始熱切補讀之前在臺灣不被允許接觸的各類禁書。然而，既往的文化薰習和師長教誨又不時發揮著韁繩作用，使我不至於一頭栽入左翼狂熱中。平心而論，那一段摸索過程是可貴的。經常換位思考的習慣，非常有助於思想的磨礪淬鍊。但不容否認的是，由於自身天賦有限，加之個性執拗等因素作祟，這樣的思索方式往往陷我於困境，尤其不利於寫作。

1991 年秋，在取得社會學碩士學位之後，我轉入同校歷史系並決心由碩士班重新出發。因為當時胸中已粗略形成一個問題意識架構，計畫以馬克思主義理論在現代中國革命運動中逐步本土化的發展歷程，作為我將來的研究主題。於是我申請跟隨歷史系以研究李大釗、中國共產主義、馬克思主義理論等議題而著名的 Maurice Meisner（1931-2012）教授作研究生。

早在轉系之前，我已由歷史系友人口中大概知曉了系上僅有的二位中國史教授的性格特質以及他們彼此之間的關係。細閱過《殷海光·林毓生書信錄》的讀者，或許會記得其中曾經提到過 Meisner 的名字。他與林老師自 1960 年代早期同為芝加哥大學研究生的時候即已彼此熟識。Meisner 師當時為歷史系博士生，林老師則

在「社會思想委員會」就讀。雖然一為馬克思主義者，一為自由主義者，但二人的交情已超越了思想壁壘，並昇華至一種共通的人文關懷高度。當聽說了殷海光先生在白色恐怖下的遭遇之後，Meisner 師深表同情，且曾受林老師請託，藉由來臺蒐集研究素材的機會，登門拜訪並慰問殷先生。儘管二位老師的學術事業日後都安駐在 UW-Madison 的歷史系，他們之間的關係反而愈趨疏遠，或許學術觀點、價值理念的分歧最終還是壓倒了一切。



進入歷史系的頭兩年，每學期都分別要上 Meisner 師和林老師的討論課，二者思維意識可以說完全是兩個世界。從學習者的角度來看，我是很歡迎這樣的課程安排的。然而，林老師對社會主義毫不掩飾的憎惡及攻擊卻令身處 Meisner 門下的我心生警惕，不免擔憂他是否會因為立場問題而對我懷有敵意。第一個學期的討論課上，就曾與林老師有過一兩次不甚愉快的言詞交鋒，更增添我對他的防禦戒心。但沒過多久我就清楚認識到，林老師愛恨鮮明的外表下，其實存在著一個是非分明的靈魂。面對這樣一位堅守原則的君子，我很快便卸下了無謂的心防，開始以平常心同林老師互動。儘管如此，我還是很少主動與林老師交流，這主要還是我的孤僻個性使然。即使面對 Meisner 師，我也幾乎沒有任何課業討論之外的往來。

1994年春，我通過了歷史系碩士論文口試。同年4月7日的日記中我曾有如下記述：

下午二時半先見林毓生教授，談碩士論文之事。林說我論文不錯，他沒有什麼意見。只問我將來治學計畫與方向。……談話至三時結束，此為吾進歷史系以來，林對我最客氣之一次談話，事後且說以後有什麼問題可以去找他。這種態度，頗令人意外。三時半於seminar報告Schwartz書中第六章有關道家部分，自覺事前準備不是太充分，報告得不很理想。林又說我的報告非常好，亦頗感意外。

可以想見，這是在經過兩年半的考察之後，林老師首度承認我有資格成為他的學生。對於他這份主動釋出的善意，我始終感念在心。

1994年11月下旬，我順利通過博士資格考的筆試與口試，從此無需再修任何課程，正式進入論文寫作階段。在11月29日下午的口試中，曾發生一段令我終生難忘的有趣插曲。林老師和Meisner師在口試進行途中，居然為了自由主義與社會主義孰是孰非的根本議題展開了一場激烈辯論。雙方都漲紅了臉互不相讓，時間持續近三十分鐘，相當於口試時間的四分之一。真正該回答問題的我，反而被晾在一邊。此時另一位口試委員，研究美國外交史的Thomas McCormick（1933-2020）教授在一旁偷笑並對著我眨眼睛，似乎已經在恭喜我通過考試。啼笑皆非之餘，更讓我警覺兩位老師對各自思想立場的堅執，已近乎信仰的程度了。

博士資格考後不久，我向Meisner師報告博士論文寫作大綱，提出將以「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史」為總主題，時間跨越1930-1980年代，涵蓋四大主題、六位主要史學家。目標在梳理這半世紀期間唯物史觀在中國的發展歷程，以及它對中國人心靈意識所帶來的影響。Meisner師認為題目實在太大且不切實際，強調若真能寫出來，我應該也到退休年齡了！但他見我不想屈服，就決定由著我自己去嘗試。

兩年後，我終於決定更換論文主題。當我一提出陳翰笙的名字，Meisner師立刻興奮起來並頻頻叫好。他表示，不止英語世界，連中文世界也沒有人好好研究過

陳翰笙，此人被忽視太久了。既然我願意去做，應該可以在幾年之內完成一篇不錯的論文，彌補學術界的缺憾。Meisner師還強調，陳氏的相關資料不多，處理起來比較不費時間，要我就寫一部有關陳翰笙的學術思想傳記（intellectual biography）即可。不料我老毛病不改，當場拒絕了Meisner師的苦心建議。我堅持認定，陳翰笙的生平與著作只夠作為論文的一章，其背後有一個更大的問題意識框架值得建構。Meisner師見我如此不知死活，也只能再度放任我自行摸索了。

1998年春系上發出通告，宣布Meisner師即將於1999年初赴英國講學一年並正式退休。4月25日下午，受臺灣友人之託送一包裹至林老師家，老師特別留我談話並詢問論文寫作情況。在聽過我的大要說明之後，林老師肯定我的論文構想確屬重要課題，值得深入研究。他隨即提醒我，Meisner即將赴英講學，告誡我千萬不可對此掉以輕心。除了建議我應立即跟導師及系秘書聯絡，將學位相關程序規定問清楚之外，他還寬慰我對論文不要看得太過嚴重，只要一個論題（thesis）建立起來，有一些小缺失並不要緊。如果可以，最好在今年之內完成論文。如果情勢有變，他還表示我可以轉入他的門下，正式成為他的研究生。林老師的這番諄諄叮囑與深切關懷令我有些驚訝，同時也非常感動。

不久，我由Meisner師那裡確認了他事實上只打算在英國逗留半年，1999年下半年就會返回Madison並開始寫作新書。系上有明文規定，教授退休後五年之內仍可擔任論文指導教授。因此Meisner師認為，他繼續擔任我的論文指導教授應該不成問題。我當時一顆懸吊著的心總算放了下來。考慮到我的論文題材與傾向，決定還是留在Meisner師門下。

如果此下論文進展順利，並在Meisner師的主持下完成博士學位，或許我與林老師的關係就僅止於曾經修習過他的幾門課程，對其自由主義理論略有所知，蒙其擔任過我各階段學位所需之考試委員，並領受過他一些善意教誨的可敬師長，如此而已，應無其他特別之處。然而世事難料，後來的變化完全出人意表。

自1996年更換論文主題以來，一個宏觀的研究大綱逐漸在我腦中成形，我將它分為三段：第一階段是

1930-40 年代的中國農村議題辯論，奠定了日後中共「新民主主義」理論的基礎，最終且促成革命行動的突破及新政權的建立。第二階段涉及 1950-60 年代新中國社會主義的具體實踐與理論探索，其中包含了大躍進、文化大革命等重大歷史議題。第三階段則將牽涉到 1970-80 年代改革開放時期的政治、經濟理論準備。我將此大綱粗略定名為「中國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發展史」三部曲，並將第一部曲命名為「中國革命的農村因素」，設定為我的博士論文主題。Meisner 師與林老師對此研究大綱皆表肯定，但也都一再提醒我要控制好論述範圍及進度。

隨著時間進入新世紀，我的六年論文寫作期限也到了。所幸學校充分尊重教授的判斷與權威，只要導師寫信支持，就能一年一次地展延。在此期間我遭遇了一些困難，身心備受煎熬。論文直到 2003 年初才有顯著進展，並完整寫出了最關鍵的兩章。暑假結束，又到了需要導師寫信請求展延期限的時候。9 月 5 日下午，我帶著兩章修訂稿到 Meisner 師的家，一進門他便告訴我，他已退休滿五年，依規定無法再擔任我的指導教授，也無法再替我寫信請求展延期限。他認為我此時只能去找林毓生教授，請求轉到林教授的門下。如果林教授願意邀請他參與指導（他還特別強調是 informally），他才適合讀我的文稿。此番話猶如晴天霹靂，讓我原本還挺高昂的情緒瞬間跌入谷底。我告訴 Meisner 師，有兩點因素恐怕對我非常不利。第一，林教授極度排拒甚至厭惡社會主義，這是眾人皆知的。第二，這也是我首度向 Meisner 師透露，林教授在 1998 年就曾經問我是否願意轉入其門下，我當時沒有同意。現在再回頭去找林教授，他是否願意收我，實在沒有把握。Meisner 師提出由他先打電話給林教授商量的建議。考慮到他們近年來不甚和洽的關係，我婉拒了，決定還是由我自己去找林老師。告辭出門之際，我看著 Meisner 師的眼睛向他真誠致意，感謝他這些年來對我的教導與幫助，特別是在過去兩年半的困難期間對我的理解與包容。基本上，我在那一刻對於能否順利完成學位已不抱任何希望了。

當晚與身在臺灣的兩位朋友電話聯絡，告知此間情況。他們都是林老師最看重的得意門生，也是長期關心

我學業進度的學長學姐。他們要我暫時別動，由他們先出面代我說項，請求林老師幫助我度過難關。經過一天的越洋懇求，9 月 6 日晚間終於得到林老師願意與我見面一談的通知。

2003 年 9 月 7 日，那是一個難忘的日子。上午十點先以電話聯絡到林老師，他讓我立刻帶著論文大綱及已完成的兩章初稿去他家。見面之後，大致敘述論文綱要以及我在過去兩年半期間的概況，林老師便開始破口大罵。從我的個性、行事風格、到社會主義的荒謬性，一路罵了近一個小時。最後他還是讓我將論文大綱及兩章初稿留下，並承諾第二天會給我明確答覆。從老師家出來，一路上只覺得眼冒金星，雙頰火燙，真是少有的挨罵經驗。回到住處後深自反省，我承認老師不少地方罵得很對，尤其是有關我個人的部分，都是在教育我。至於他痛斥社會主義的部分，只能算是一種出自特定立場的情緒外溢，就不必放在心上了。

第二天下午兩點林老師來電，語氣變得非常溫和，直言他覺得我這兩章論文寫得不錯，應有資格取得學位，所以決定幫助我。林老師言出必行，立即開始為我奔走協調。起初，他也明白我的工作屬於 Meisner 的領域，照理仍應由 Meisner 繼續指導。於是，兩位老師為了我這個學生開始密切聯繫，並同系上交涉。最終達成一項行政決定，由林老師出面擔任我形式上的導師，或稱代理導師（acting advisor），Meisner 則繼續擔任導師（advisor）。僅在三天之內，我由一個自忖必死的局面突然獲得兩位資深教授的加持，變成同時擁有兩位導師，自己都覺得難以置信。不久形勢再生變化，林老師實質接手，成為我唯一的導師了。

接下來我與論文又奮戰了兩年，直到 2005 年 6 月 17 日通過口試，8 月 10 日繳交論文，完成所有正式程序。最終，我成為林毓生教授在 UW-Madison 執教 34 年期間最後一位畢業的學生。林老師在這兩年期間對我的付出與關照，可謂不遺餘力。其中細節多屬個人恩義，在此就不贅述了。相較於私人恩情之描繪，我更願意將林老師品格性情中最崇高率真的一面呈顯出來，奉獻給世間精勤向上的靈魂們。

自決定收我為學生之後，林老師便不只一次鄭重申

明，他是一個老派的自由主義者（old-fashioned liberal），完全不同意我偏向社會主義的立場。但就因為兩點，決心全力助我度過難關。第一，他看得出我有嚴肅的求真精神，他很肯定這一點；第二，我已經寫出的兩章初稿他覺得很好，希望我務必完成全部論文。總之，他提醒我不要以個人恩惠，或是拉幫結黨、樹立門派的角度去看待他對我的幫助，更勉勵我將來也應以超越個人立場或私人情誼的原則去立身行事。聽到老師這番表述，我深受震撼且衷心感佩。對我而言，這是一堂可貴的人格教誨，其價值遠勝於任何學問點撥。

之前在林老師課上，曾不止一次聽他嚴厲抨擊中共對現代中國社會的定性，所謂「半殖民、半封建」的說法，他認為簡直是荒謬絕倫。隨後便盯著我問，究竟這一半一半是如何計算出來的？當時我還未深入研究相關議題，只能緘默不語。直到他讀了我的論文初稿，其中一章闡述了陳翰笙及其領導的「中國農村經濟研究會」成員，運用現代社會科學方法進行農村經濟調查，並確認現代中國的核心議題是土地兼併問題。他才對我表示，那的確是一個有意義的論題。林老師尤其稱許我將「半殖民、半封建」總結為「不是指兩個分別並存的特質，而是一個共同特質的兩個面向」，認為此句頗有畫龍點睛之妙。從那時起，我感覺老師在面對社會主義課題時變得比較審慎，至少不會輕易否定或大動情緒了。

經過幾次坦誠而深入的談話後，我意識到既往對老師也存在著不少誤解。儘管他的議論言詞偶有過度嚴厲急切之處，林老師其實絕非偏執之人。他完全有能力超越既定立場，以一種坦蕩開明的心態去理解或評論不同知識系統下的理念。他之所以偶有嚴厲或急切的表現，多半還是同交流對象之人品或智性水準有關。林老師徹底喚起了我對自由主義思想體系的敬慎態度和研究動力。在他的理論啟迪與人格感召下，我也開始學習化解我心中的成見偏見，並將不同的概念或行為納入更寬廣的歷史脈絡中去理解審視。老師不僅在思想上為我開啟了一

片新天地，更促使我於生活中不忘包容各類奇聞異見。

畢業返臺後，雖遠隔重洋，林老師仍深切關注著他在臺灣每一位門生的志業與動向。2006年春，正在杭州講學的他很慎重地為我寫了一封推薦信，助我找到一份專任教職。在一通電郵函件中，老師再度提醒我不要被私人恩惠看待此事，並期勉我盡力扮演好教師與史學家的雙重角色。同年7月，林老師還特別託人帶給我一個手提公事包，祝福我即將展開的新生涯。

每一次訪問臺灣，林老師一定會召集他所帶過的學生聚會，殷殷垂詢各人治學及工作概況。老師自己始終維持著如研究生一般的讀書思考作息，他也期許他的學生們勤奮精進。基本上，每次師生聚會都只談學問，不講閒話。令人印象最深刻的一次聚會，正是在他對臺灣民主化進程深表失望的那一回。老師親自列了一張以自由主義經典為主的書單，要求我們精讀這些作品。他還想著藉此帶領學生重新出發，為民主理念再闢蹊徑。老師甚至宣布，以後每次回來都要考核我們的讀書心得。可惜不久因為他健康出現問題，師生聚會遂成絕響。

2014年秋，我終因無法適應當前學院規範而永久離開了體制。雖然失去部分生活保障，但在家人的支持下，倒也換得些許學問自主空間。幸或不幸，尚難論定。我選擇不向林老師稟報此事，避免徒增憂慮，竟也因此導致數年未與老師、師母通問音訊的遺憾。無論如何，老師的品格、理念、訓勉，當然也包括了他曾惠予我的諸多恩情，終將長在我心，沒身不忘。

如今恩師仙逝，哀悼之餘，謹以此文略述我所親歷有關林先生的見聞印象。這些記述與林老師的學術思想或許沒有直接關聯，卻是我認為最值得留存的珍貴回憶。學術思想有其時代、文化、地域等限制，唯有人格與性情，方能突破時空侷限，達到獨與天地精神往來之境界。林老師的學術成就及思想深度，其實正建構在他高尚人格與純粹性情的基礎之上。不知當今學界又有多少仁人志士願認同此理，並踐行其道？